

房山石經《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發微

張雪松

摘要：《韓國佛教全書》收入的義湘《華嚴一乘法界圖》是以大谷大學藏正德二年寫本等傳世文獻互校而成。而約十二世紀的房山石經收錄金代《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除了文字校勘的意義之外，最為引人注意的是署名為“儼法師造”。《一乘法界圖》與智儼本就具有密切的關係，從思想原創性上來說《一乘法界圖》的正文很難說對智儼既有著作有多少超越，義湘最大的創新之處就在於用方印的形式對 210 字的 30 句七言詩進行排列組合。在房山石經中《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是單本刻經，並不屬於大藏經系統，出資刊刻的信徒，很可能更重視的是文字排列成“印”的神秘宗教效果，而非哲學思辨討論，類似於對待總持陀羅尼的心態。房山石經《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除了對探討唐代智儼、高麗義湘等華嚴學者的哲學思想、文獻版本有重要意義，也對理解遼金佛教徒的信仰實踐，對漢語系佛教文獻神秘形態符號表徵的意義，具有重要的價值。

關鍵詞：《華嚴一乘法界圖》、義湘、智儼、房山石經

新羅名僧義湘(625-702)，入唐後師從智儼(602-668)，與法藏(643-712)同學，回國後弘揚華嚴學說，被後世尊稱為東海華嚴初祖。義湘在東亞佛教史上地位尊崇，但本人著述卻很少，《三國遺事》卷四“義湘傳教”說義湘“著《法界圖》書印並略疏，括盡一乘樞要，千載龜鏡，競所珍佩，餘無撰述，嘗鼎味一臠足矣。圖成總章元年戊辰，是年儼亦歸寂，如孔氏之絕筆於獲麟矣。”¹現存義湘的主要著作只有一部篇幅不長的《一乘法界圖》及其注釋。義湘之後，歷代韓國佛教僧侶對《一乘法界圖》以及義湘本人的注釋都進行了許多闡釋。

約十二世紀的房山石經金代“單本刻經”《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鐫刻了《一乘法界圖》的正文三十句七言詩。就現有版本來看，房山石經的版本是最為精良的。《韓國佛教全書》收入的義湘《華嚴一乘法界圖》是以傳世文獻《續藏經》(第二編八套四冊)本、《大正藏》(第四十五卷)本，以及大谷大學藏日本正德二年(1712)寫本，三本互校而成。其序言云：

夫大聖善教無方，應機隨病非一。迷者字迹，不知失體，懃而歸宗末日。故依理據教，略制槃詩。冀以執名之徒，還歸無名真源。讀詩之法，宜從中法為始，繁迴屈曲，乃至佛為終，隨印道讀(五十四角，二百一十字)。²

上述傳世三本皆為“迷者字跡”，而房山石經為“迷者守跡”，顯然傳世本的“字”是“守”之誤，應據房山石經本校改。又“懃而歸

¹ 一然撰，權溪煥、陳浦清譯注《三國遺事》，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第393頁。

² 《華嚴一乘法界圖》(『화엄일승법계도』)，《韓國佛教全書》第H0028號，第2冊。第1頁上欄第5行以下。

宗末日”，傳世本中《大正藏》本作“未日”，其餘兩本皆作“末日”，而房山石經本作“未日”。從文意上看，當為“未日”，意即無日，迷者即便勤勉，亦永遠不能歸宗，從而突顯製作《一乘法界圖》驚醒迷者的必要性。此外，“迷者”，房山石經本作“迷之者”；“無名真源”，房山石經本作“無名之真源”。除了文字校勘的意義之外，最為引人注意的是房山石經《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的署名是“儼法師造”。³因此，有學者提出，按照房山石經的署名，《一乘法界圖》的正文210字詩應是出自義湘的中國老師智儼之手，高麗義湘只是對這首210字詩進行了闡釋。⁴確實在日韓很早就存在著《一乘法界圖》正文210字詩文出自智儼的說法，例如高麗均如(917-976)《一乘法界圖圓通記》：

謂《元常錄》云：“相公於儼師所受《花嚴》時，儼師造七言三十句詩，以授相公。相公則於墨字上，畫赤印以獻。師歎曰：‘汝窮證法性，達佛意旨，宜造於釋。’相公初造四十餘紙釋以進師，師欲知合佛意否，將至佛前，立願燒之，悉皆燒盡。又造六十餘紙進，亦燒盡。又造八十餘紙進師，師共相德，亦如前燒之。於中有燒不燒。不燒之文，今行於世。”一云崔致遠所述《傳》中云：“相公於儼師所受《花嚴》時，夢有神人，貌甚魁偉，謂相公曰：‘以自所悟著述施人宜矣。’又夢善財授聰明藥十餘劑。又遇青衣童子，三授秘訣。儼師聞之曰：‘神授靈貺，我一爾三。遠涉勤修，厥報斯現。’因命編次，窺奧所得。於是奮筆，緝《大乘章》十卷，請師指瑕。儼曰：‘義甚佳，詞尚壅。’乃退

³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房山石經》第28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627頁。

⁴ 姚長壽《房山石經華嚴典籍考》，《法源》1998年第16期，第25-37頁。

而芟繁爲四通，號曰《立義崇玄》，蓋欲崇其師所著《搜玄分齊》之義。儼乃與相詣佛前，結願焚之。且曰：‘言有脗合聖旨者，願不蕪也。’既而煨燼之餘，獲二百一十字，令相拈拾懇誓，更擲猛焰，竟不灰。儼含涕嗟稱，俾綴爲偈，閉室數夕，成三十句。括三觀之奧旨，舉十玄之餘美，故七言三十句，亦相公所述也。”後義可許，然不必依崔《傳》定也。今釋，既自叙云：“依理據教，略制槃詩”，則所釋亦是圖主自述斷矣。何須傍引證據耶？况《至相行狀》中，不載制此七言三十句事耶。⁵

引文中的“相公”即湘公，指義湘。十世紀高麗均如引用的《元常錄》早已亡逸，不知何書。《元常錄》認為《一乘法界圖》210字正文的作者是智儼，而崔致遠的《義湘傳》則認為是義湘。均如依據“依理據教，略制槃詩”便認定210字正文的作者和後面的注釋者必然是同一個人，似失之武斷，至少這種因果關係在今天看來並不十分明顯。均如說至相寺智儼的《行狀》中沒有記載他寫過《一乘法界圖》，但現存的義湘的早期傳記中實際上也沒有記載義湘有《一乘法界圖》這樣的著作。《宋高僧傳》只提到義湘弟子將老師的講授問答編輯成《道身章》，“或以處為名，如云《錐穴問答》等數章”，⁶即《道身章》又以義湘的居所命名為《錐穴問答》。

《宋高僧傳》說義湘是“以總章二年(669年)附商船達登州岸”，⁷但智儼在總章元年(668年)便已去世，《宋高僧傳》的這一記載肯定是錯誤的。崔致遠《海東華嚴初祖忌辰願文》：義湘“直泛重溟，

⁵ 《一乘法界圖圓通記》(『일승법계도원통기』)，《韓國佛教全書》第H0055號，第4冊，第1頁上欄第8至第15行。

⁶ 贊寧撰，范詳雍點校《宋高僧傳》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6頁。

⁷ 《宋高僧傳》上冊，第75頁。

高登彼岸，於龍朔二載（662年）詣終南山至相寺，以儼和尚為嚴師，以藏和尚為益友。”⁸《三國遺事》卷三“前後所將舍利”引用《浮石本碑》：義湘“永徽元年庚戌，與元曉同伴欲西入，至高麗有難而回。至龍朔元年（661年）辛酉入唐，就學於智儼。總章元年，儼遷化。咸亨二年（671年），湘來還新羅。”⁹慶尚北道的浮石寺是義湘的根本道場，據《宋高僧傳》所載，浮石傳說是善妙龍所化，“現大神變於虛空中，化成巨石，縱廣一里，蓋於伽藍之頂，作將墮不墮之狀。”¹⁰崔致遠的願文和《浮石本碑》是較早較為可信的歷史記載，則義湘是661年入唐，662年來到終南山至相寺跟從智儼學習。智儼於668年去世，義湘於671年回國。

義湘的生平歷史記載其實是比較清楚的，但《宋高僧傳》為何會出現義湘在“總章二年”才來到中國的記述呢？筆者認為，這很可能是想將義湘投入智儼師門後與智儼便去世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即將義湘塑造成為智儼臨終受囑弟子。《宋高僧傳》中沒有終南山至相寺智儼的傳記，法藏《華嚴經傳記》卷二有智儼傳，謂其卒於總章元年，“俄至十月二十九日夜，神色如常，右脇而臥，終於清淨寺焉。”¹¹從現存的早期法藏傳記，可以看到當時是將法藏塑造為智儼在總章元年去世前認定的接班人，如崔致遠《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第三科曰：及總章元年，儼將化去，藏猶居俗（時年二十六）。儼乃累道成、薄二大德曰：‘此賢者注意於《華嚴》，蓋無

⁸ 崔致遠《崔文昌侯全集》，漢城（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37頁。

⁹ 《三國遺事》，第286頁。

¹⁰ 《宋高僧傳》上冊，第76頁。

¹¹ 石峻、樓宇烈、方立天、許杭生、樂壽明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73頁。

師自悟，紹隆遺法，其惟是人！幸假餘光，俾沾制度。”¹² 在崔致遠的著作中強調的是法藏在智儼將要去世時還是居士身份，被智儼念念不忘；而稍後《宋高僧傳》說義湘在總章二年來到中國，亦可以起到智儼臨終前獲得高足的意味，所以前引《三國遺事》中說：“是年儼亦歸寂，如孔氏之絕筆於獲麟矣”，亦有突出智儼臨終受記義湘的意味。

現存史料都將《一乘法界圖》的撰寫時間確定在智儼去世的總章元年，其實上也有類似的效果，暗示了義湘撰寫完成的這部著作完全可以繼承和廣大其即將去世的老師智儼的衣鉢，這也是《一乘法界圖》獲得崇高盛譽的一個原因。因此說《一乘法界圖》與智儼本就具有密切的關係，就其思想內容來說，《一乘法界圖》本文強調的內容基本上不出智儼的華嚴思想，甚至一些核心語句的表述也與智儼已有著作十分類似，例如《一乘法界圖》中說：“一中一切多中一，一即一切多即一”¹³，跟智儼《華嚴一乘十玄門》中：“一中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¹⁴十分近似，只是將“一中多”改為“一中一切”，“一即多”改為“一即一切”，從而湊成七言一句。

“如孔氏之絕筆於獲麟矣”这个比喻是将智儼比喻成孔子，孔子獲麟即智儼獲得高足義湘，之後孔子絕筆去世。然孔子絕筆這個譬喻，似乎也暗示《一乘法界圖》是智儼的最後著述。按照均如《一乘法界圖圓通記》中的說法，《華嚴經》中有七十三處涉及海印三昧，故智儼

¹²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당대천복사고사주변경대덕법장화상전』), 《韓國佛教全書》第 H0054 號, 第 3 冊, 第 77 頁中欄第 20 行至 23 行。

¹³ 《華嚴一乘法界圖》(『화엄일승법계도』), 《韓國佛教全書》第 H0028 號, 第 2 冊第 1 頁上欄第 14 行。

¹⁴ 《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 3 冊, 第 21 頁。

做了七十三个印，而《一乘法界圖》是这七十三个印的總印，“又古德云：此印是摠相印，七十三印，是別相印。”¹⁵ 又《法界圖記叢髓錄》法融德記云：“儼師雖作七十三印，但欲現其一印之義，而相和尚深得師意故，唯作此一根本印也。”¹⁶

如果從思想原創性上來說，《一乘法界圖》的正文很難說對智儼既有著作有多少超越，義湘最大的創新之處就在於用“印”的形式將 210 字的 30 句七言詩排列組合出來。義湘在對《一乘法界圖》進行注釋時說：“一問：何故印文唯有一道？答：表如來一音故。所謂一善巧方便，何故多有？繁迴屈曲，以隨衆生機欲不同故。即是當三乘教，何故一道無有始終？顯示善巧無方，應稱法界，十世相應，圓融滿足故。即是義當圓教，何故有四面四角？彰四攝四無量故。此義依三乘顯一乘，印相如是。”¹⁷ 義湘將 210 字，拐了 54 個彎（“五十四角”），構成一個四方印的形狀。每個字是黑色，字與字之間用一道紅線連接，這在《法界圖記叢髓錄》等文獻中有大量的討論。

房山石經《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也是採取的上述形式。在房山石經中，《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是屬於單本刻經，即原本不屬於大藏經系統，是信徒單獨刻印的石經。從現存文獻上來看，《一乘法界圖》自晚唐以來，一直未出現在中國佛教文獻中，而在金代刻經中突然出現，很可能是從朝鮮半島傳入中國的。高麗與遼金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遼史·二國外紀》中說：“高麗與遼相為始終二百

¹⁵ 《一乘法界圖通記》(『일승법계도원통기』),《韓國佛教全書》第 H0055 號,第 4 冊,第 4 頁中欄第 1 行至第 2 行。

¹⁶ 《法界圖記叢髓錄》(『법계도기총수록』),《韓國佛教全書》第 H0107 號,第 6 冊,第 771 頁上欄第 4 行至第 6 行。

¹⁷ 義湘《華嚴一乘法界圖》(『화엄일승법계도』),《韓國佛教全書》第 H0028 號,第 2 冊,第 1 頁中欄第 10 至第 17 行。

餘年。”¹⁸《金史·外國下》：“金人本出靺鞨之附於高麗者，始通好為鄰國，既而為君臣”。¹⁹《三國遺事》中說：“本朝睿廟時，慧照國師奉詔西學，市遼本大藏三部而來，一本今在定惠寺。大安二年，本朝宣宗代。祐世僧統義天入宋，多將天臺教觀而來。此外方冊所不載，高僧信士，往來所齋，不可詳記。大教東漸，洋洋乎慶矣哉”，²⁰並非誇張之辭。

房山石經只刻印了《一乘法界圖》的 210 字正文，並沒有刻印義湘的解釋說明；出資刊刻的信徒，很可能更加重視的是文字排列成“印”的神秘宗教效果，而非哲學思辨討論，類似於對待總持陀羅尼的心態。與其同期刊刻的署名“平壤新城人”²¹的《健拏禪訶一乘修行者秘密義記》一般認為受到密教的影響，其文末亦刊此種以線連字、迴環曲折的方印模式。

《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出現在房山石經的金代單本刻經中，對於我們理解金代的佛教，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遼金經幢陀羅尼的突變現象，即從遼代早期一直到遼代晚期將近 150 年的時間裏，僅見一座梵漢對照的陀羅尼經幢，但從遼道宗晚期到天慶年間，遼地大量出現梵漢對照的經幢；金代繼續延續這一風格，而且更多的是用純梵字咒。²²張明悟認為這是由於道殿《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廣泛流行的影響，道殿對西天梵字特別推崇：

問曰：何以梵字皆有如是不思議神用？答謂：每一一

¹⁸（元）脫脫等撰《遼史》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519 頁。

¹⁹（元）脫脫等撰《金史》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2889 頁。

²⁰《三國遺事》，第 284 頁。

²¹《房山石經》第 28 冊，第 628 頁。

²²張明悟《遼金經幢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年，第 102-105 頁。

字即體，是諸佛菩薩身心故。又即體是離相法界故，又即體是教理行果故，所以有不思議神用（西天梵字，法爾本有。但世界初成時梵王傳說，不同此方字是蒼頡等創製）。若爾應西天梵字皆有不思議神用，何得偏說真言中字？答謂：真言中字，法爾諸佛不思議力加持故，法性如是故，偏有神用。如此方言語，是一唯急急如律令等語，呪火不燒，呪水不熱。蓋作呪語，偏有功用，非餘一切言語皆有如是功用，西方字亦爾。字雖是一，謂作真言中字，偏有神用，非餘一切字皆有如是神用也。²³

魏晉南北朝佛教界就曾就梵文與中文的優劣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討論。²⁴ 道殿《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的上述討論極大地提升了梵文在陀羅尼經咒書寫中的地位，深刻地影響到遼金佛教徒的信仰實踐。但是，這並非意味著方塊漢字完全失去了“神秘力量”。相傳《一乘法界圖》正文 210 字也是入火不燒，與梵文經咒同樣有不可思議力加持。金代人鑄刻義湘排列組合成的“方印”文字，同樣彰顯出漢文在經咒書寫中的重要意義。因此說房山石經《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除了對探討唐代智儼、高麗義湘等華嚴學者的哲學思想、文獻版本有重要意義，也對理解遼金佛教徒的信仰實踐，對漢語系佛教文獻神秘形態符號表徵的意義，具有重要的價值。

²³ 《大正藏》編號 1955，第 46 冊，第 996 頁下欄第 8 行至第 996 頁下欄第 18 行。

²⁴ 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年，第 78-87 頁。

參考文獻

原始文獻

- 《一乘法界圖合詩一印》，一卷，儼法師（待訂）著，《房山石經》，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28冊。
- 《一乘法界圖圓通記》（『일승법계도원통기』），二卷，（高麗）均如（917-976）著，《韓國佛教全書》第H0055號，第4冊。
- 《三國遺事》，五卷，（高麗）一然（1206-1287年）編，權溪煥、陳浦清譯注，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
- 《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石峻、樓宇烈、方立天、許杭生、樂壽明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宋高僧傳》三十卷，（宋）贊寧（919-1001年）等編，范詳雍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法界圖記叢髓錄》（『법계도기총수록』），二卷，佚名，《韓國佛教全書》第H0107號，第6冊。
-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脫脫（1314-1356年）等編成於1344年，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당대천복사고사주변경대덕법장화상전』），一卷，（新羅）崔致遠（857年生）著，《韓國佛教全書》第H0054號，第3冊。
- 《崔文昌侯全集》，崔致遠著，漢城（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社部，1982年。
- 《華嚴一乘法界圖》（『화엄일승법계도』），一卷，（唐）義湘（625-702年）著，《韓國佛教全書》第H0028號，第2冊。
- 《遼史》，一百一十六卷，（元）脫脫（1314-1356年）等撰成於1344年，

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東亞語研究

姚長壽《房山石經華嚴典籍考》，《法源》第16期，1998年，第25-37頁。

張明悟《遼金經幢研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

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